

文匯報

回忆录·1

風雨中
走來



文匯出版社

文匯報

回忆录·1

從風雨中 走來

文匯報報史研究室編

文匯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3 号

封面题字：钱君匋

责任编辑：陆炳元(特约)

封面装帧：陶雪华

从风雨中走来

文汇报回忆录①

文汇报报史研究室 编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 江 伟 业 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000

印数：1—8000

印张：13.625

ISBN 7—80531—244—5/G·153

定价：8.00 元

前 言

在文汇报创刊 55 周年的前夕，《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①》在报社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出版了，值得庆贺！

文汇报从 1938 年 1 月创刊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平凡历程。出版这部回忆录，正是想通过本报老同志对往事的回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出文汇报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从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给后人以启示、教育和力量。

这本集子是文汇报回忆录的首卷。从时间上来看，大致是从 1938 年创刊至 1956 年迁址北京改出教师报，后又回上海复刊。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成 4 个方面：记述文汇报的创刊、被迫停刊、创办香港文汇报、大陆解放后复刊及改为教师报前后的历程；采编生活杂忆；专刊副刊的创办与特色；忆故人。从这近 60 篇史料丰富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汇的历史传统，文汇的战斗精神，文汇的办报风格和文汇的版面特色。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报社的同仁来说，无疑是一笔应当继承和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于年代久远，对往事的回忆往往不可能都十分完整和准确，加上对同一件事，各人的看法也会不尽一致，所以，这本集子中对

有些事情的记述和看法可能不完全一样,这在所难免,相信读者是会理解的。

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为汇编出版这本集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希望爱护本报的社内外同志,对文汇报报史研究工作继续给予关心和支持,以促成文汇报回忆录第二卷早日问世。

张启承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目 录

前言	张启承
1 文汇报的诞生	徐铸成
13 文汇报招牌字的来历	余鸿翔
15 “孤岛”时期的文汇报	徐铸成
42 诞生十七天挨炸记	毕志奋
45 一张情报卡	邵红叶
49 大同坊的岁月	周福宽
57 像彗星掠过上海夜空	
——抗日烽火中的文汇报晚刊	周起芑
61 克明其人其事	储玉坤
74 国统区的一面进步旗帜	官 乡
77 与国民党警察局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文汇报被迫停刊七日前后	柯 灵
82 增资招股话往事	周福宽
85 一次“鸿门宴”	徐铸成
91 封门后的紧张一幕	嘉 尧
95 香港文汇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黄立文
106 新的转折	
——文汇报第二次复刊的一段回忆	徐铸成

111	忆“救报运动”	庄人葆
116	记忆深刻的两次运动	孙葵君
122	从文汇报到教师报	叶夫
130	我们与文汇报共过患难	徐金礼 徐维海 曹德荣 周伯贤 魏华宣
135	留在记忆里的片断	钦本立
141	那个艰辛的年代	沈国祥 刘剑钊
147	梅园采访杂忆	黄立文
165	石头古城“逐鹿”记	郑永欣
184	蒋介石记者招待会	唐海
188	下关事件我见我闻	黄立文
196	李公朴事件报道前后	刘时平
200	震撼全市的摊贩事件	崔景泰
204	“特别”的采访	唐海
208	采访劝工大楼惨案追忆	崔景泰
213	在采访学生运动的日子里	麦少楠
220	艰难时世 峥嵘岁月 ——追忆我在文汇报的记者生活	陈霞飞
227	访问马寅初及其他	王易今
235	历经坎坷终不悔 ——驻穗记者生涯回顾	陈朗
239	我深深怀念那段生活	梅朵
246	三千毛瑟精兵 ——关于当年文汇报新闻标题和《编者的话》 的片断回忆	程光锐
254	忆在文汇报任经济编辑	秦柳方

261	文汇报生活琐忆.....	李梦莲
272	从投稿者到编者.....	徐凤吾
277	闲话夜编怀故旧.....	蒋定本
287	“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 ——抗战初期《世纪风》的回忆.....	徐开全
299	大胆、泼辣,喊出人们的心声 ——柯灵主编的《读者的话》.....	黄立文
314	一封读者来信的奇遇.....	韦 芜
320	《星期谈座》纪实.....	陈尚藩
337	四十年代的《笔会》副刊.....	唐 弢
343	关于《各地通讯》版的回顾.....	胡钟达
354	《新文艺》周刊杂忆.....	陈白尘
358	回忆《新经济》.....	寿进文
360	《新闻窗》始末.....	石啸冲
367	李平心与《每周社谭》.....	叶 冈
370	三个黄金时代 ——徐铸成同志的办报生涯.....	唐 海
379	“壶嘴总是噘着的” ——追念徐铸成老师.....	崔景泰
384	我所知道的严宝礼先生.....	储玉坤
399	严宝礼的经营之道.....	戚家柱
404	魂兮归来——悼马季良(唐纳).....	黄立文
409	忆马季良先生.....	任嘉尧
412	缅怀孟秋江.....	黄立文

417	怀念与追思	
	——孟秋江同志二三事·····	崔景泰
421	能干的女将	
	——浦熙修与文汇报·····	谢蔚明
427	后记	

文汇报的诞生

徐铸成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上海便被敌人占领了。从此，开始了恐怖的“孤岛”生活。

敌人占领上海后，当年12月12日，上海各报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告，大意说，工部局已应日军当局的要求，自16日起，所有华商报纸，应一律受日方的新闻检查。经各报主持人紧急磋商，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报（原为民国日报，“一·二八”抗战时，国民党屈服于日方的抗议，改称民报）这几家报纸，决定于14日起自动停刊。在大报中，只有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

据我所知，当时这两家报纸作出此屈辱决定，情况也有所不同。新闻报资方一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而时报的老板原是华侨巨商黄伯惠，久已别有经营，不问馆事，大权操在经理王季鲁之手，而王则早与日方有勾结。所以，后来两报的态度也不一样，前者只是“噤若寒蝉”，后者则张牙舞爪，完全以汉奸报的面目出现。

我参加文汇报的经过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报纸停刊的次日，立即宣布，工厂暂时

维持，其余职工，除留一部分清理善后外，一律遣散，给薪3个月作遣散费。我也在被遣散之列。

对我来说，这不啻是闷头一棍。第一次尝到失业的痛苦，还在其次，主要是多年来的一个幻想破灭了。

我出生于贫寒家庭。父亲原来当小学教师。后来，由亲戚“提携”，到保定车站当一名文书，月薪不足30元。所以，我中学是进的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没有毕业，1926年借文凭考取了清华大学。读了半年，父亲实在负担不起，加上借文凭事被母校举发，不得不退学。翌年，考进了免收学费的北京师大。那时，正是北洋军阀政府土崩瓦解的前夕，平汉路欠薪往往达半年之久，我不好意思再向父亲伸手要钱，由一个亲戚介绍进国闻通讯社当抄写员，每天下午课余，赶去刻写约两小时钢板，月薪20元，这样才维持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翌年，国民党军攻占了北京。许多机关、官僚纷纷迁往南京，北京被改名为北平，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我写信给胡政之，认为国闻社应改以文教新闻为采访重点。他极表同意，并嘱我多抽出时间，试“跑”这方面的新闻。从此，我算是正式当了新闻记者。

当时，“新记”大公报出版不久，胡政之颇留心于吸引人才。国闻社兼负大公报的采访任务，我在一次赴太原采访华北球类比赛，随后又赴沈阳采访华北运动会的新闻中，为大公报写了不少“独家新闻”，他大概看出我还有新闻敏感，也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因此，就多次派我赴太原、广州等地，作为特派记者，采访政治新闻。并曾派我担任国闻社北平分社的代理主任。我那时才22岁，对他如此提拔重用，不胜如遇之感。1929年冬我结婚后，被调到天津报社任编辑工作，月薪增至100元。1931年冬又调往汉口任办事处主任，又增为150元。胡政之还不止一次的勉励我，要我把大公报当作终身的事业，不要仅仅当作一个职业。他说：大公报是“文人办报”的企业，全靠“有志之士”共同办好，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对这

些话,深信不疑,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不遗余力把工作做好。

1936年上海大公报创刊,我任要闻编辑,每天熬夜到天明。一周中,还有两个晚上,要在发完稿子后赶写国闻周报的“一周时事说评”和“大事记”,往往在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背着书包上学了。

“八·一三”抗战开始,工作更繁重,每晚要守候长江同志(当时任采访主任)等从前线打来的电话,报告最后的战讯。同时,国闻周报改出《战时特辑》,内容主要是由我辑选的抗战新闻和国内外评论。那时,我忽患慢性盲肠炎,医生一定要我住院动手术,我怕影响工作,每天还依旧忍痛上班。

所有这些,说明我的确是把大公报当作终身的事业,忠心耿耿地为它工作。想不到老板忽然铁面无情,一脚把我从这个“家”里踢出来了!

不久,我接到重庆国民公报总编辑杜协民兄(原天津大公报的同事)来信,请我担任该报驻沪记者,月给40元。这样,我算有了半个职业。

那时,李子宽兄(原上海大公报副经理)被留下来负责办理沪馆的善后事务,每天仍到报馆办公。他还经常要给汉口大公报拍发新闻电。为了交换消息,我也不时去报馆,和他晤谈。

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闲谈,忽然有两个人来找他,一个穿西装的,40岁模样;另一个年轻一点,是在大公报当过广告员的。李陪他们到排字房和机印车间看了一遍,回来时还在边走边谈,随后他们就告辞走了。我问李:“他们来和你谈些什么?”李说:“他们要创办一个新报,想找我们代印。还有,他们还没有请到总编辑,托我介绍。老兄有意一试吗?”办报而没有总编辑,岂非笑谈?我只哈哈一笑,回绝了。

为什么胡政之把职工解散了,独独保留工厂?据我事后了解,一则,他怕解雇工人;比较棘手;二则,他怕一旦战事结束,重装机器和排字设备,需要时间,影响立即复刊;而重新组织编辑、经理两

部人员，他认为是比较容易的。这也可以反映，那时他没有估计抗战会拖得那么长。另外，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打算，这是过了更久以后，李子宽兄才告诉我的。后面再谈。

在和李会晤后几天，大约在1938年1月20日左右。储玉坤忽来访我。他是我的同乡，半年前参加新闻报工作。他说，因为反对新闻报受敌方检查，故已和郭步陶等四五个人一起退出新闻报。“现在，我已参加了即将出版的文汇报，任国际版编辑。此来，是奉命专程约请你写社论的。”我问：“每月写几篇？”他说：“每天一篇。”这就是说要我包办了，忙问：“言论有没有限制？”“题目和内容，一切由你决定，报社保证不加修改。”他还补充说：“是按篇计酬，每篇10元，但目前营业尚无把握，暂按4折实付。我们职工的薪金，也是这样计算的。”我问明了创刊的大约日期，答应稍加准备，即按日交稿。

我去找了也在“孤岛”赋闲的老同事杨历樵兄，请他分担这一工作，每月写10篇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论。这样，我每写两篇，有一天可以休息和思考一下。

到了1月25日，就送来了文汇报的创刊号，一看字模和拼版格式，就知道它原来就是在大公报代印的。而馆址设在福州路436号，分明是原大公报营业部的地址，一定是由大公报转让给他们的。

报纸标明是英商，报头下注明发行人兼总主笔是克明H. M. Cumine。创刊号第一版还刊载他的一篇发刊词《为本报创刊告读者》。其中有一段说：“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负责设法消除之。”显然，他是以发行人的名义，担任着保镖的角色。

我们写的社论，于28日开始登载，第一篇的题目是：《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内容大意是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希望读者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共救国家的危亡。

到2月初，上海纷传敌人将在南京筹备组织伪政府，温宗尧、梁鸿志等跃跃欲试。我于8日写了一篇《告若干上海人》，对那些民族败类作最后的警告。想不到10日报馆就挨了手榴弹，营业员陈桐轩殉职，广告员萧岫卿、毕祉芬（志奋）被炸伤。据报载，报馆9日就接到署名“正义团”的恐吓信，说“贵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务望改弦更张，倘再有反日情绪存于其中，即将与对付蔡钧徒者同样对付。”

蔡钧徒是出版不久的社会晚报社长，原来听说他曾和日方有过往来，后因所求不遂，又在报上登了一些“反日”消息，结果被敌人绑去杀死，悬首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的电线杆上，恐吓爱国人士。当时中外文各报曾刊载此事。

我看到这消息后，既愤慨又不安，立即打电话给储玉坤，问社论要不要继续写，“如果要改变态度，我就不准备写了。”他说：“当然还是要写。”我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最好你去问问报馆的当局为好。”过了半小时，他打回了电话，说：“已请示过严宝礼，严斩钉截铁地嘱咐我，务必请你照样写下去。”

胡政之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看了几天文汇报，就看出社论是我和杨历樵写的，特地让李子宽去问杨：“文汇报社论的风格，很象大公报，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杨兄的性格一向谨慎而胆小，红着脸回答：“我不知道。”

就在文汇报被炸的那天下午，胡政之忽然派汽车来接我（他那时留沪正准备续弦，和顾维钧的侄女结婚）。我和他同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相隔不过几百步，本来是用不着车子的，如此邀约，颇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

他一反平常的严肃态度，含笑问我李子宽所问过的同一问题。我说：“这是我试着写的，胡先生看还可以吗？”他说：“很好，很好，流畅得很，措词似乎激烈些，怕会出事。”我连忙说：“已经出事了，今天报馆已被敌人投掷了炸弹。”他安详地说：“我在报上已看

到了。我请你来,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如果我们和他们合作,你估计他们的态度会不会变?”我说:“我想不会。”我就把上午和储玉坤通话的内容告诉了他。他说:“那好,我的想法是,向他们投资1万元,条件只有一条,由你和王文彬参加,你主持编辑部,文彬任采访主任兼编本市新闻。”“经理部不参加什么人?”“不,我们投资的目的在于营利,只要它保持言论态度不变就好了。”接着他说:“你如果同意,我让子宽找严宝礼具体商谈。”

商谈的经过很顺利,据李子宽告诉我,文汇报原来的资本,号称1万元,实际只收足约7000元,所以经营十分困难,出版了20天,不仅排印费未付过,白报纸也全由大公报垫用。“如果不增资,他们将难以维持下去。至于你和文彬的参加,他们更求之不得。他们正苦于编辑部群龙无首,胡惠生(当时文汇的总编辑)只在民报编过各地新闻,掌握不了全局。”我问:“难道他们是无条件接受合作吗?”李说:“他们只提一条,他们原来的资本要作为原始发起股,升值为两万元。”“胡先生同意了?”“完全同意了。”我听了很纳闷。投资的比例明明是7000对1万,股权却变成了两对一,也就是说,大公报只占总额的1/3。胡政之的算盘一向是很精的,怎么这次却如此慷慨、大方?

总之,我于他们双方合作谈妥后,就立即到文汇报“走马上任”了,时间大约在1938年的2月20日左右,距创刊不到1个月。

我“履新”的那天中午,严宝礼特别请我吃饭,由储玉坤作陪。严说了些“久仰”和“一切仰仗”的话,还谈了些具体问题:一、我的月薪,规定为400元。他说:“目前只能按四折实发。这样实在太少了。你写的社论,仍另外计酬。”他还说:“我们已向全体职工宣布过,如果销路超过5000,广告费达到月收5000元,即改为5折发薪。照此类推,广告和发行都超过1万,即十足发薪”。二、希望我把文汇报当作自己的事业。他愿意把“发起股”让给我和储玉坤各1000元。我们实付500元,可以分10个月在薪资里扣缴。

我正式参加文汇报约两个月后，严宝礼给我送了一张股东的名单，其中，大公报的1万元，分别列在李子宽、费彝民和胡政之的两个女儿的名下，胡本人却未列名。我便中向李子宽问其所以。他这才告诉了我一段内幕。原来，在上海大公报停刊后，蒋介石在汉口交给张季鸾两万元，囑转交胡政之，在上海办一张“法商”的报纸，定名正报，想不到法租界公董局很胆小，怕得罪日本人，说：“你们大公报原来是设在法租界的，如果复刊，我们负责保护。要创办新的报纸，我们决不同意。”胡保留工厂，本来也是为了创印正报的，计划未能实现。恰巧，看到我为文汇报写社论，就移花接木，和文汇报合作。这样，就可以向蒋介石交帐。而且投资的1万元，言明分月在排印费及填付白报纸项下扣除。这样，他并没有付出现款。这两万元，他不久就带往香港，作为创刊大公报港版的经费。他和严宝礼都打好了如意算盘，各得其所。

文汇报的摇篮——新新俱乐部

文汇报的创立，是由少数几个并无资财的人，偶然凑合起来的。据其中的一位对我详谈经过如下：

在南京路的新新公司(旧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现在的上海食品一店旧址)附设的新新旅馆里，也和其他较大的旅馆一样，不少大的房间被人包租，作为吃喝玩乐的“俱乐部”。其中，313号有两大间，被租为“俱乐部”的历史最为悠久。它的成员，主要是以严宝礼为中心的一批两路局——京(南京)沪、沪杭铁路局的中级职员。

严是江苏吴江人，曾肄业南洋公学，在路局任会计处稽核；又集资开办了一个交通广告公司，主要经营路牌广告，也代办报纸的广告。因此，他和若干大小报馆的人员有关系，如新闻报的严独鹤、徐耻痕以及社会日报(小型报)的胡雄飞等，都被吸收参加了这

个“俱乐部”。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路局遣散了绝大部分职工。严宝礼等拿到从千余元到几千元不等的遣散费(其中，大部分是按路局章程规定，每月在本人工资中扣存的储蓄款)。

拿到了这笔钱，是坐吃山空呢，还是做些生意营利？他们在俱乐部里议论开了。严宝礼一向被目为“智多星”，他想出了个主意，说租界已发生粮食恐慌，而他的家乡吴江是盛产大米的，他自告奋勇，愿意冒险去采办。于是，有的出1000，有的出500，集了1万元。但正当严准备动身的时候，敌军已侵占了沪西和南市，并宣布粮食禁运。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怎么办呢？胡雄飞、徐耻痕等提出，“目前，好几家报馆停刊了，而上海市民都十分关心抗战。如果以这笔钱办一张报纸，不愁没有销路。”大多数人赞成其议，主张立即着手。也有胆小的或认为是冒险而无利可图的，借口退出，有的则缩回去一部分。结果，实际集资约7000元，这就是文汇报的开办费。

要刊载抗战新闻，避免日方检查，就必须挂洋商招牌。恰好，“俱乐部”成员中，有一个叫方伯奋的，是跑马厅的职员。他说，他和跑马厅的英人克明相熟，而克明是曾担任过英文文汇报(The Mercury)记者的，如果请他出任发行人，相信他会愿意的。

果然，方伯奋第二天来汇报，说克明已经满口答应，提出的条件是，他要兼任董事长职，每月薪金300元；他的儿子小克明(取中国名字为小明)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设董事会，中、英董事各5名，英籍董事都要由他介绍，每人每月各送车马费百元。

于是，就赶忙筹组董事会，并根据英国公司法，向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立案。

5名英国董事，有怡和洋行的路易·乔治，有某汽水公司的萨门。其余3人，我不清楚。

中国的5名董事，则为：严宝礼、胡雄飞、沈彬翰(上海佛学书